

货币价值与转形问题^{*}

——对于“新解释”、分期单一体系学派与转形问题关系的研究

高 伟

摘要：转形问题传统解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忽视货币。在古典解法和斯拉法解法终结之后，转形问题研究在近 20 年来的发展是围绕着“新解释”理论和分期单一体系学派的主线进行的。“新解释”与分期单一体系学派通过重视货币价值（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的倒数）对于马克思价值-价格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思路，通过货币价值直接链接了价值与市场价格。“新解释”和分期单一体系分别在自己的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基本理论的正确性。但是货币价值的决定却是复杂的，价格由抽象劳动建立起来的方式是复杂的，需要一个可以恰当处理这种复杂性的理论来解释。虽然“新解释”和分期单一体系提出了围绕价值形式、劳动力价值、货币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却没有成功地解决它们。

关键词：“新解释” 分期单一体系学派 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 转形问题

一、引言

自马克思的“转形问题”被提出以来，众多的经济学家对于如何从价值推导到价格（实质是马克思的生产价格）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但是，无论是转形问题的古典解法，还是古典解法终结后的斯拉法（Sraffa）解法，无论是马克思的支持者，还是马克思的反对者，所关注的转形问题的核心是一样的，那就是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关系，而在其中，对于真实的市场价格的研究是一直被忽视的。转形问题的古典解法因为“不变的前提假设”而到 Seton (1957) 就止步不前了，随后的斯拉法解法和 Samuelson (1971) 的实物矩阵法所得出的“双体系”结论显然是反对马克思的，因此这两类解法都不能令马克思的赞成者满意。20世纪 80 年代之后，部分马克思的赞成者开始独辟蹊径，从货币价值的角度来研究价值-价格问题。“新解释”理论与分期单一体系学派（The school of temporal single - system，简写为 TSS 学派）通过重视对于货币价值的研究而直接链接了价值与市场价格，使人耳目一新。

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新解释”理论与分期单

体系学派（TSS）对于货币价值，进而对市场价格决定的研究成果，指出两者的成功之处与缺陷，以及他们同传统的转形问题的关系。

一、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新进展

忽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马克思之后的研究者的一贯做法，这一局面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才得到改变。标志马克思货币理论新进展的文献主要包括 de Brunhoff (1976)、Foley (1983, 2003)、Arnon (1984)、Itoh 和 Lapavitsas (1998)。我们这里集中于“新解释”和 TSS 的代表人物对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探讨。

“新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 Foley (1983) 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最重要的观点是货币是价值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分析中将商品的价值置于货币之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货币只能在对于商品价值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到解释。货币是价值的社会表示，我们可以把价值看作两种形式：商品和货币。每一单位的货币都可以看作代表了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这可以被称为“货币价值”，即平均一单位货币表示的社会劳动数量，可以用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

* 感谢导师林岗教授对于本文的指正。

(Monetary Expression Labor Time, 简写为 MELT) 的倒数表示。因而,货币是重要的。

TSS 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 Freeman (1996) 也认为,与对于马克思的传统解释不同,商品是与货币相交换的,而不是与商品相交换,货币是作为一个“蓄水池”,而不是作为一个流量而发挥作用的;马克思的“第一个总量相等”(即总价值等于总价格)不仅仅适用于生产价格,而且适用于真实的市场价格。因而,货币是重要的。

Foley (1983, 2003) 提出了要建立现代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问题。Foley 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存在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现代货币体系中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将马克思的一般等价物理论应用到现代货币体系之中。Foley (1983) 认为,马克思的一般等价物理论可以解决 19 世纪的货币理论的所有主要问题。通过确保其他货币替代物与金之间的可交换性就可以保证金(即它的生产条件所决定的它的价值)最终决定货币的价值。但是一旦这种可交换性被取消,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就出现了问题:信用货币和纸币的价值如何决定?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如何反击李嘉图和后来的经济学家的“货币数量论”?我们需要知道在基于政府信用的现代货币体系中是什么过程支配着货币价值本身的运动。20 世纪晚期,货币与货币商品的价值之间的联系更加微弱了。因此,研究非商品货币的价值决定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Foley 认为,必须首先区分“货币价值”与“货币商品的价值”,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没有区分这两种货币价值。“货币商品的价值”指物化在一单位特殊商品(可能作为货币发挥作用)之中的劳动时间;而货币价值是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总劳动时间与总增加价值的比率。价格是在特定的场合一个商品所控制的货币数量;而价值是物化在特定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数量。要建立与货币数量论不同的马克思现代货币理论,必须坚持两点:(1)货币价值是由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的价格决定从而历史地决定的;在任何时候,货币依然是价值形式,依然表示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抽象劳动;货币价值随商品价格的涨落(由于资本主义企业出手商品的难易)而落涨;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是通过改变平均的商品实现条件而做到改变货币价值的。(2)给定货币的价值,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在货币价值水平上货币和信用机制如何使得商品流通顺畅?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是通过信用的扩张和萎缩做到这一点的。20 世纪 70 年代的慢性通货膨胀必须在变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

中寻找答案;通货膨胀相对于信用市场和对于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说,是变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副产品。

Foley (1983)、Fine (2004) 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价值决定的秘密存在于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之中。货币的价值随生产的商品价格的涨落而变化。商品的出售难易影响了商品价格,进而影响了货币价值。需求旺盛时期将通过资本主义企业提高价格而导致货币价值下降,危机时则正好相反。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逻辑顺序是货币价值问题先于流通中介数量问题。在商品货币场合,货币价值由商品货币价值近似地决定;在不依于商品货币的货币体系中,货币价值则可以自由变动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其他矛盾,但是,这种自由变动并没有改变马克思理论分析的逻辑顺序,货币价值依然先于货币数量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是建立马克思现代货币理论的关键。

虽然“新解释”和 TSS 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对货币价值的决定做出了如此深入的探讨,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在建立自己的转形模型(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价值-价格模型)时,却采取了极度简化的方式,使得他们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实际相脱节。我们将在下面几部分中清楚地分析这些缺陷。

二、“新解释”理论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Duncan Foley (1982, 1986) 和 Gerard Dumenil (1980, 1983 - 1984) 提出“新解释”(New Interpretation) 以来,这一对于链接价值与价格的独特理论就受到了普遍重视,在近 20 年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关于“新解释”发展和批评的文献,具体包括:对“新解释”进行解释和扩展的文献,主要包括 Lipietz (1982, 1983, 1984)、Glick 和 Ehrbar (1989)、Devine (1990)、Mohun (1993)、Campbell (1997)、Moseley (2000)、Foley (2000),对“新解释”主要持批判态度的文献主要包括 Anwar Shaikh 和 E. Ahmet Tonak (1994)、John Roemer (1990)、Alfredo Saad - Filho (1996)、Ben Fine、Costas Lapavitsas 和 Alfredo Saad - Filho (2004)。

Foley (1982, 1983, 1986, 2000) 与 Dumenil (1980, 1983 - 1984) 提出的“新解释”的介入点是“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等于货币价值的倒数)。主张劳动仅仅通过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才变成抽象的和社会化的,货币是抽象劳动的不通过中介的、直接的、唯一的表达形式,用货币表达的价值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层面上是占主导地位的。“新解释”的主流观点认为价值与价格相等只在净产品层面上才成

立,生产价格的决定只影响增加的价值的分配。Foley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增加的价值与现行劳动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新解释”独辟蹊径,从非传统的理论层面证明了马克思转形问题的两大命题的正确性。

(一)“新解释”的主要观点

“新解释”认为,马克思理论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思想,即货币代表了社会劳动时间。“新解释”认为,马克思(1867,1894)清晰地论述了,与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一样,实际的市场价格在一般意义上可能与物化劳动不相一致,而且马克思清晰地使用了在劳动时间和货币价格之间进行转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货币理论是相融合的。不论采取的货币体系如何,马克思的理论都暗含着在任何特定时期都存在货币单位和社会劳动时间的等同关系。Foley将这一关系称为“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示”(MELT),它以每小时劳动多少货币单位来计量,马克思经常利用这一概念在货币和劳动之间推演。而Sraffa解释和Samuelson解法的“双体系”的思维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货币方面。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是生产中的活劳动的耗费向生产投入增加了货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任何时期的生产中增加的价值就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统计量,即净国内(或国民)产值。因而,MELT的恰当定义是一个比率,即一个时期内现行价格的国内净生产总值与经济中耗费的活生产劳动(时间)的比率。

但是,这样定义的MELT,虽然清晰地链接了货币与劳动时间,但是并不依靠于任何特殊的货币体系假设。也就是说,这样定义的概念并没有使我们致力于任何关于MELT决定的特殊理论。例如,在以黄金为货币标准的经济中和在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中,货币都可以看作在数量上(部分的)表示社会劳动时间。

MELT使得我们可以解决劳动价值论中的其他大量的问题。例如,在总量上“劳动力价值”必须被测度为这样一个比率,即货币工资对MELT的比率,而不是被测度为工人消费的商品中物化的劳动。利用这一定义,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总剩余价值与生产工人的未支付劳动之间的等同问题就消失了,因为耗费的总劳动的支付与未支付部分在定义上等于净国内产品中的工资和总利润部分。结果,测度为国民收入的总利润部分的比率的剥削率与相应的用劳动时间等同量表达的比率相一致。实际上,这种形

式的对于劳动时间和MELT的定义是仅有的可以在总量上保持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与未支付劳动的数量相等关系的定义。

“新解释”采取了另类的方法来定义劳动价值论的相关范畴以保持马克思的关键结论,即资本总利润等于未支付劳动。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新解释”是一个“解释”,而不是一个“解法”,因为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提出了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范畴的独特的定义方式和顺序。

(二)“新解释”的一个简单表达形式

下面给出“新解释”的一个简单的数学形式,以说明它对于劳动与货币关系的处理方法。

假定总利润为P,总净收入(总收入减去非工资成本)为R,货币工资率为w,总活劳动时间为L,总剩余价值为S,比率为L/R(即货币价值,以下以m表示,MELT的倒数)。我们可以立即得出以下三个方程:利润等于净收入减去工资,剩余价值等于活劳动减去工资表达的价值,净产品的价值等于活劳动:

$$P = R - wL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1)$$

$$S = L - wLm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2)$$

$$Rm = L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3)$$

方程(3)暗示净产品的货币价值的劳动等价物等于总活劳动。虽然这一方程是同义反复,但是通过给出m的定义,“新解释”用它作为马克思的总产值等于总价格的命题(虽然适用于净产出而不是总产出)的对等物。用m乘以方程(1),并用方程(3)来替代Rm,得出:

$$Pm = L - wLm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4)$$

或者表示为:

$$S = Pm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5)$$

正如马克思的命题所表达的一样,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这样,好像价值理论已经被证实了,因为马克思的两个备受争议的解决转形问题的命题都可以被纳入一个完全一般性的框架之中。

就这样,“新解释”通过自己对于MELT的定义,在自己的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的两个总量不变的原理(在这里,“新解释”用的是净产品,而非马克思所说的总产品,因此是在自己的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

Foley(2000)自己对于“新解释”评价甚高,认为“新解释”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中发挥的作用与牛顿定律在力学中发挥的作用类似。MELT的定义类似于在牛顿力学中指定力等于质量与加速度的乘积。F = m也仅仅是三个理论概念之间的定义关系,但是却是实质的关系,正如MELT仅

仅是货币量与活劳动时间之间的定义关系一样。

三、分期单一体系学派

分期单一体系学派的经典文献包括 Kliman 和 McGlone (1988, 1999)、Freeman 和 Carchedi (1996)。该学派认为,在转形问题的分析中,不应当用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来分别论述,而应当在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把两个体系变成一个体系,而且对时间进行分期研究。他们主导的这一方法所代表的学派被称为分期单一体系学派。

所谓“单一体系”是反驳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马克思的价值体系和价格(生产价格)体系是两个不相关的体系的论点,TSS 通过链接价值体系和生产价格体系而得出马克思的所谓的两个体系是不成立的,两个体系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这样就将两个体系合并为一个体系。TSS 学派所用的链接价值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工具正是“新解释”所提出的货币价值的倒数。通过定义 MELT,就可以在价值和货币价格之间直接进行任意转换。所谓“分期”是指 TSS 学派不同意转形问题的正统解法和“新解释”的同期解决或解释方法。TSS 认为“新解释”只是局部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因为“新解释”解决的只是增加值,即净产品的价值-价格问题,而 TSS 学派则试图在完整的意义上证明马克思的基本结论。

TSS 学派有两个假设前提:第一个假设是产品的价值和价格是分期决定的,在同一时期中,其产出价值与投入价值(价格)一般是不相等的,投入价格视为既定,或者说由前一期决定;第二个假设是商品是与货币交换,而不是与商品交换,所以必须重视货币的作用,TSS 学派同样采用了劳动时间(价值)的货币表示的范畴,但是认为该值在同一时期内是给定的,并且保持恒定,TSS 学派就利用该范畴在价值(劳动时间)和价格(货币表示)之间进行任意转换。

TSS 学派通过其分期模型得出了 7 个结论:(1)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成立;(2)价值不能是负值;(3)正剩余价值是正利润的充分必要条件;(4)价值生产与价格和利润决定相关;(5)在利润分配中利润率不变;(6)奢侈品部门的生产影响一般利润率;(7)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会导致利润率下降(Kliman and McGlone, 1999)。

我们这里通过一个模型来证明第一个结论。TSS 模型分为时间离散模型和时间连续模型,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这里采用的是 McGlone 和 Kliman (1996) 的离散时间模型,该模型的前提是不考虑联合生产和不考虑固定资本的存在。

模型如下:

$$\text{总价格: } p_{t+1}q = (1 + r_t)p_t K q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1)$$

$$\text{总价值的货币表示: } v_{t+1}q = p_t A q + l q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2)$$

$$\text{总利润: } r_t = (r_t)p_t K q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3)$$

$$\text{总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示: } s_t = l q - p_t w l q \quad \dots \dots \dots \quad (4)$$

符号说明: p_t 是初始投入的单位价格向量,视为已经给定,或由前一期决定;即价值(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假设其给定,并且在 t 时期内保持恒定; p_{t+1} 是待决定的产出价格; A 是单位实物投入矩阵; w 是单位活劳动的实际工资向量; l 单位产出的活劳动向量; q 总产出向量; K 是总投入矩阵,即 $K = A + w l$; r_t 表示利润率; v_{t+1} 是产出的单位价值向量。

由于价格利润率: $r_t = (l q - p_t w l q) / p_t K q$ 。通过这一中间公式可以很容易地证明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成立,即上面的(1)式等于(2)式、(3)式等于(4)式。

四、对于“新解释”理论和分期单一体系学派的评析

关于“新解释”和 TSS 的联系,Foley (2000) 认为,只要单一体系解释前后一致地将 MELT 定义为净产品的货币价格与耗费的活劳动之间的比率的话(为了在分析中保持新价值,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总量不变,就必须坚持这一定义),在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与单一体系解释之间就没有什么不一致。Freeman、Carchedi (1996) 试图发展的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分期单一体系”解释没有能够提出一个单一的、逻辑一致的关于 MELT 的定义,而这一定义对于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言是必需的。Foley (2000) 认为,这一定义必须与“新解释”的定义相一致,如果不这样的话,分期单一体系解释得出的结果就不能保持工资和总利润与已支付和未支付劳动的比率关系。

“新解释”与 TSS 的主要区别如下,TSS 学派的解法实质是假定初始价格给定,它是已知量,而不是待求量,并且假定 MELT 给定,且在同一时期内不变,这样就可以在价值和价格之间自由转换,起始价格(已经是通过转为的量)加上本期的活劳动的通过转换的价格就可以得出本期的产出价格。“新解释”理论由于只考虑增加值,而没有把不变资本的价值转移纳入分析之中,所有没有必要研究不变资本的期初价格是如何决定的。

Foley、Dumenil 的“新解释”通过重新定义货币价

值认为总净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是相等的,因而净产品的总价值与总价格是定义相等的,而且通过重新定义劳动力价值而得出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也是相等的,因此在总净产品的层面上取消了转形问题。“新解释”独辟蹊径,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解决)转形问题。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解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新解释”所重新定义的马克思的基本范畴是有价值的,但不是在转形问题上。“新解释”通过重视货币问题而直接链接了价值与价格,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它却没有涉及转形问题的实质。而与之相比较,TSS学派将货币价值在同一时期内视为既定和不变的做法显然还远不如“新解释”的货币价值决定令人信服。

“新解释”和TSS分别在自己的意义上证明了马克思基本理论的正确性。但是货币价值的决定却是复杂的,价格由抽象劳动建立起来的方式是复杂的,需要一个可以恰当处理这种复杂性的理论来解释。虽然“新解释”和TSS提出了围绕价值形式、劳动力价值、货币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动态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但是却没有成功地解决它们。

五、小结

我们看到,“新解释”理论和TSS证明转形问题所用的方法本质上是一样的,即通过MELT在价值和价格之间任意转换。“新解释”将MELT定义为国民收入净产值与当期活劳动时间的比率,而TSS学派将MELT假设为在同一期中保持不变。但是两者都没有说明MELT的决定机制。因此,“新解释”理论和TSS都提出了由价值到真实的市场价格的问题,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对于其中间过程和机制的研究依然需要深入,在这一问题上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释:

本文中使用TSS代表分期单一体系学派。

例如,Foley(2003)承认在现代货币体系中,利润的平均化、企业的管理绩效、垄断因素以及供需情况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价格只能间接地反映社会劳动时间。

另外,对“新解释”理论的实际应用的文献主要包括:Mark Glick和Hans Ehrbar(1987)、Simon Mohun(1994)、Edward Wolff(1987)、Fred Moseley(1990)、Senchak(1983)、Azari(1996)、Matthews(1995)、Alemi(1997)和Dumenil、Levy(1994)。

这里采用的是Ben Fine、Costas Lapavitsas和Alfredo Saad-Filho(2004)提出的模型,这一模型简单明了,而且阐明了“新解释”理论的全部要义。

转形问题的正统解法主要包括古典解法和Samuelson等人提出的“双体系”解法,这里注意,Okishio的时间连续性解法、Morishima的迭代解法(马尔科夫过程)除外。

TSS学派所证明的马克思基本理论不只是两个总量

相等,而且还包括Okishio提出的“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定理”(FMT)、利润率下降规律。

当然TSS学派的模型并不是都做这样的假设,如Kliman和McClone(1999)考虑了联合生产问题,Alan Freeman(1996)考虑了存在固定资本的情况。

关于p_c和p_v是如何得出的,TSS学派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这也是TSS的缺陷之一。

参考文献:

1. Marx, K.,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ollected Works. Vol. 2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2. Marx, K., 1981. Capital. Vol. 3.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3. Foley, D., 1982. "The Value of Money, the Value of Labour Power and the Marxian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4 (2): 37 - 47.
4. Foley, D., 1983. "On Marx's Theory of Money." Social Concept, 1 (1): 5 - 19.
5. Foley, D., 2000.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2 (1): 1 - 39.
6. Foley, D., 2003. "Marx's Theory of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Marx's Theory of Money: Modern Appraisals" at Mount College, August 4 - 8, 2003.
7. Duménil, Gerard., 1983. "Beyond the Transformation Riddle: A Labor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 Society, 33 (4): 427 - 450.
8. Duménil, Gerard., 1984.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sited: A Brief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33: 340 - 348.
9. Lipietz, A., 1982.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6 (1): 59 - 88.
10. Fine, Ben, Costas Lapavitsas; Alfredo Saad-Filho., 2004. "Transform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Why the 'New Interpretation' Is a Wrong Turning."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36 (1): 3 - 19.
11. Freeman, Alan and Guglielmo Carchedi, eds., 1996. Marx and Non-Equilibrium Economic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12. Kliman, Andrew and Ted McClone., 1999. "A 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Value Theo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999(11).
13. Mongiovi, G., 2002. "Vulgar Economy in Marxian Garb: A Critique of Temporal Single System Marx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2(34).
14. Laibman, David., 2002. "Value and the Quest for Core of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2002(34).
15. Mohun, S., 2000. "Notes and Comments: New Solution or Re(in) statement? A repl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4: pp. 113 - 117.
16. 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形问题的历史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朱钟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8. 朱钟棣:《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日]伊藤诚、[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N、K)